

延安时期“毛泽东思想” 概念生成的演进逻辑

张忠山 陈 磊

摘 要:关于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实践中经历了由教条式地照搬俄国经验,到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转变。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命题,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命名准备了先决条件。在此基础上,伴随革命实践的深入开展,党的理论工作者渐次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有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命名的逻辑起点;进而提出中国共产党产生了“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命名提供了必不可少的中间环节;继而提出“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到达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命名的(初步的)逻辑终点,为“毛泽东思想”概念的正式提出准备了必要条件和舆论氛围。“毛泽东思想”概念演进的过程,表明马克思主义具有开放性的特征,是辩证唯物论与特定历史时代和社会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关键词:延安时期;“毛泽东思想”概念;演进逻辑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从1938年10月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到1945年4月党的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经历了“毛泽东思想”概念提出、获得党内认同并上升为指导思想的历史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推动

理论与实践双向互动,逐渐认识到已经产生“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先后提出“有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等逻辑相关的概念,并筹划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进行命名。这些概念的先后提出,呈现为在实践基础上概念依次演进的逻辑路径,表明

作者简介:张忠山,男,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陈磊,男,西南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与实践研究”(项目编号:18CDJ008)。

了认识形成的阶段性和渐进性。因此,探讨“毛泽东思想”概念形成的演进逻辑,对于再现历史过程的真实性、生动性,对于继续拓展毛泽东思想研究的视角,具有一定意义和价值。

一、中国共产党“有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作为认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理论体系,将其运用于具有各自特殊性的社会形态和国家实际,必然需要处理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中国共产党对于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实际的认识,经历了一个较为漫长的历史过程,才逐渐形成正确的思想路线。在国际共产主义阵营和中国共产党党内,长期存在将苏联经验绝对化和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的思想倾向^①,中国共产党对如何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革命实际的正确认识,是在同这一倾向作斗争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土地革命时期,党内教条主义者制定的革命战略策略脱离中国的具体国情和社会发展阶段,给革命事业造成严重危害,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中国共产党抵达陕北后,开始从思想路线的角度反思党的历史问题,同时共产国际更加重视推动将马克思主义应用到各国的具体环境中去。抗战以来,毛泽东代表的政治路线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和认可,进而公开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命题。这时,党的一些理论工作者认识到,中国共产

党在革命实践中已经“有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②,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提出和命名迈出了重要一步。这个认识的形成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

从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走上井冈山开始,在实践中另辟蹊径,走出一条不同于俄国十月革命道路的革命模式,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渐次成型,开始了对中国革命道路和科学指导理论的探索。1930年5月,毛泽东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主张“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③,实际上是提出要在革命实践中创造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形态。

经历了土地革命时期革命热潮与低谷跌宕起伏的巨大反差,党中央抵达陕北后开始反思革命路线问题。毛泽东基于对政治路线、军事路线、思想路线三个维度的反思,认为要彻底地克服党内“左”倾传统,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实际问题,必须“普及与深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唯物辩证法)于多数干部中”^④。

此时,共产国际七大决议提出推动马克思主义“具体化”,要求将马克思主义应用到各国的具体环境中去。因此,1936年3月张闻天在政治报告中首次提出,推动共产国际七大决议“民族化”^⑤。这一思想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营造了政治氛围。

在抗日战争初期,随着敌后根据地的陆续创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战争的环境

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修订)》,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7页。

②艾思奇:《论中国的特殊性》,《中国文化》1940年创刊号。

③《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6页。

④《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10页。

⑤《张闻天年谱(1900—1941)(修订本)》(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版,第217页。

下开始党政军民建设的宏大实践。毛泽东的政治主张和军事战略在实践中被证明是正确的,逐步得到党内绝大多数干部的支持,进而获得共产国际的肯定。1938年9月,王稼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传达共产国际指示:共产国际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①。这一表态成为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命题的政治前提^②。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指导革命行动的指南,但必须与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以一定的民族形式呈现,在革命实践中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③。这一命题的正式提出,是为了纠正盲目照搬苏联革命经验和共产国际指示的教条主义倾向,表明在中国革命实践中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的理论自觉。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谱系中,联共(布)以马克思主义的唯一继承者和权威阐释者自居,中国共产党和各国共产党只能是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的继承者与实践者,苏联的革命模式和经验做法成为各国共产党必须遵循的指导方针。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则呼吁回到马克思主义经典,提出从中国实际和革命实践出发重新阐释马克思主义的主张,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举起“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旗帜,要求在指导理论上克服十月革命模式存在的局限性。这段论述成为中国共产党阐释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的经典论述,为理论工作者阐释马克思主义指明了实践维度和理论向度,进而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命名准备了先决条件。

1939年2月,洛甫指出,“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当前中国的民族解放指明了正确道路和具体方法^④。中国共产党立足现实国情,“善于运用各国以往的革命经验,正确把握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完满地、一贯地、澈底地提出了现时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的理论纲领与策略”,同时申明为将来实现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社会奋斗的最高纲领。因此,“我们今天研究近代世界革命运动史,必须善于把握着运用在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⑤。这一论断的提出,对于确立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方法以及提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命名,营造了理论氛围和认识前提。

到了1939年4月,时任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主任艾思奇明确提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概念。“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之产生,不仅植根于中国古代追求天下为公的文化土壤,而且最重要的因素是中国产生了无产阶级这一创造共产主义社会的力量,在五四运动中迅速成长起来,并且成立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共产党^⑥。

1939年12月,王稼祥提出这样的认识:中国共产党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和理论,主要表现在:其一,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具体

①徐则浩编著:《王稼祥年谱(1906—1974)》,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96页。

②《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231页。

③毛泽东:《论新阶段》,《解放》1938年第57期。

④洛甫:《共同防共即是灭亡中国》,《解放》1939年第63、64期合刊。

⑤陈昌浩:《近代世界革命史·绪论》第1卷,解放社1939年版,第13页。

⑥艾思奇:《五四文化运动在今日的意义》,《新中华报》1939年4月28日。

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在革命实践中将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创造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中革命运动的理论与实践”。其二,中国共产党“在十多年斗争中创造了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与实践”,关于“民族统一战线的经验是有贡献于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并且值得这些国家革命者的研究”。其三,“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早在1927年即“预见了中国革命的武装斗争的方式”,在革命实践中总结了军事斗争的发展规律^①。

1940年1月,洛甫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不是固定僵化的教条,而是科学的生动的革命理论与方法,在同党内外敌人作斗争的革命实践中向前发展。中国已经有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向中国共产党人提出在革命实践中“创造中国的马列主义作品”的任务^②。与此同时,艾思奇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有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论断。中国共产党在近20年的革命实践的基础上,“已经产生了一些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因此也就有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这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的著作,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书籍”^③。

为扫除党内教条主义思维,打破对于苏联革命经验和理论的迷信心理,必须以无可辩驳的实践做法,论证马克思主义与各民族实际相结合的必要性和科学性。而列宁、斯大林在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建设时代的新条件中,将马克思主义“俄国化”,推动马克思主义发展为列宁主义、斯大林学说,这一做法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光辉典范,在马

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示范效应。

为论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与合理性,当时延安的一些理论工作者主张仿效马克思主义“俄国化”的经验。例如,时任八路军军政学院教员和培元提出,列宁斯大林推动马克思主义与帝国主义时代革命实践、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的结合,用一些新的实践经验和理论原则丰富充实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表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的领袖的著述,继承并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学说。他认为对党的历史和实践经验进行理论总结,必将在革命实践中推动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④。这是对于“有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认识的进一步深化。

伴随革命实践的深入发展,党内关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认知也日益深化,对于中国共产党“有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共识也多了起来。这一命题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命名的逻辑起点,表明党在走向理论自觉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一步,由此认识到必须在实践中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进而产生了不同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这一命题为扭转党内教条主义一度盛行而造成的某种程度的思想依附状态提供了锐利的理论武器,为驳斥党外攻击马克思主义为不合国情的“舶来品”的论调,提供了“中国化”的理论资源。这一命题表明马克思主义具有开放性特征,是辩证法唯物论与特定的历史时代和社会

①《斯大林同志六十诞辰 本市举行盛大庆祝会》,《新中华报》1939年12月30日。

②洛甫:《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解放》1940年第103期。

③艾思奇:《论中国的特殊性》,《中国文化》1940年创刊号。

④和培元:《论新哲学的特性与新哲学的中国化》,《中国文化》1941年第3卷第2、3期合刊。

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二、引入“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阐述毛泽东的理论贡献

抗战相持阶段到来后,随着八路军、新四军敌后工作的深入展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根据地人口的规模空前壮大。创建根据地的丰富经验,在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中是史无前例的鲜活实践,是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革命实践的产物。这一实践活动反映在理论层面即是“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命题的提出。自当时的中央宣传部秘书长杨松首次引入这一命题后,延安一些理论工作者开始积极用这一命题宣传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共产党人的理论贡献,为经典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之间,提供了一个必不可少的逻辑链条。当初的理论工作者在前线工作期间,见证了毛泽东的思想路线有效推动了抗战实践的开展,从1941年开始积极宣传毛泽东的思想^①,将其视为“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进行系统的理论研究。

为了克服苏联经验绝对化和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的思想倾向,当时延安一些理论工作者采取“师夷长技”的方法,注重引用列宁、斯大林关于“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和“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论述,借鉴马克思主义俄国化的经验和做法,为中国共产党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而产生一种新的理论形态提供合法性依据。列宁把马克思主义者分为,只限于表面上承认马克思主义的论述的教条主义和依据具体环境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布尔什维主义这两

个互相斗争的派别。随着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进一步发展,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尤其是中国问题的论述,是“创造性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斯大林生活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时代,“以创造性马克思主义的精神,继续丰富了发展了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和策略,特别是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理论和策略,给了中国问题比以前马克思主义宝库中所存有的更多更具体的指示”^②。通过引证列宁、斯大林在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的时代条件下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论述,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为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发展马克思主义提供合法性论据。

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从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为要旨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命题,飞跃至创造有别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形态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命题,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某种程度上是谋划独立自主的重大政治宣示。对于这两个命题之间的理论阐释,必须具有理论自洽和遵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传统的双重特性,弥合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时空距离。因此,一些理论工作者引入“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概念,作为连接两个命题的过渡环节。

1939年5月至1941年3月,延安中高级干部普遍开展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简称《联共党史》)的学习^③,各抗日根据地也先后跟进学习。《联共党史》阐明了联共中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其一,共

^①刘海藩、朱满良主编:《中共中央党校名师》第1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版,第302页。

^②张如心:《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前进》,《解放》1941年第127期。

^③杨松:《关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书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底宣传》,《解放》1941年第128期。

产党人必须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实质,学会在具体的革命环境中运用其实际问题,善于运用新的实践经验丰富发展这一理论^①。其二,贯彻斯大林将马克思主义分为“创造性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马克思主义”的指示,提倡将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运用于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②。该书还列举以列宁为代表的联共(布)推动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典型事例。比如,列宁根据对俄国国情的具体分析,适时放弃了各国马克思主义者坚持的议会制民主共和国的国家形式,提出成立苏维埃共和国作为无产阶级政体。又如,列宁从20世纪初期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历史趋势出发,抛弃了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中叶提出的社会主义革命在发达国家同时胜利的旧公式,提出社会主义革命在一个国家首先胜利的新理论^③。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斯大林“是创造的马克思主义最卓越的代表”,提出了在苏联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学说^④。

当时延安的一些理论工作者受此启发,开始运用“创造式的马克思主义”概念论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合理性,并运用“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提法批驳党内的教条主义。在此背景下,以《解放》周刊为代表的中央理论刊物,译介大量源自苏联报刊的文章,重申《联共党史》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这样的认识和做法,为中国共产党在革

命实践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而产生一种新的理论形态提供了合法性依据。

1939年8月,杨松译文指出,《联共党史》是“创造式的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在苏联建成社会主义的时代充实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学说^⑤。从目前的材料可见,这是延安时期理论工作者首次译介“创造式的马克思主义”概念。此后,这一概念得到理论界的广泛使用。他们就如何推动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发展,提出了各有侧重的路径方法。毛泽东主张的“用马克思主义的工具——唯物辩证法”来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⑥,成为当时理论工作者展开论述的方法指南。

艾思奇引证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俄国化的论述,借以论证只有运用辩证唯物论和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方法来研究中国的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⑦,进而决定中国共产党在民族革命中的具体任务及战略策略,才能成功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八路军军政学院教育长张如心提出,主要学习毛泽东在推动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发展方面的光辉典范。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论著,具体展现了如何具体分析中国社会特点,进而揭示其规律性的模范例证。全党阅读研究这些著作,“不仅可以找到分析环境、研究中国社会、解决中国革命的方法,而且还可以学习到如何去进行各个

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91页。

②[苏]耶鲁斯拉夫斯基著,帅哲译:《斯大林是联共(布)党底历史家》,《解放》1941年第124期。

③《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91—393页。

④[苏]莫洛托夫著,吴文焘译:《斯大林——列宁事业的继承者》,《解放》1940年第109期。

⑤[苏]曼努伊尔斯基著,杨松译:《斯大林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为共产国际二十周年纪念而作)》,《解放》1939年第81期。

⑥杨松:《关于马列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中国文化》1940年第1卷第5期。

⑦艾思奇:《论中国的特殊性》,《中国文化》1940年创刊号。

地区、县区、乡区政治经济情况研究的具体例证”,为全党研究各个地区提供了具体可行的方法示范^①。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论述,是对创造性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的深刻阐释,也是自身关于如何发展创造性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呈现。毛泽东比任何人更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创造性运用于中国具体环境的斗争中来,《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更是天才卓绝的创造性马克思主义的作品”,对于中华民族解放和人类解放事业是“最有历史意义的贡献”。他呼吁全党对这些著作在理论和方法上作出综合结论,用于教育全党,首先教育正在学理论的干部。这一做法,不仅对于教育全党具有重要意义,而且是推动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最有力的方法”^②。毛泽东关于抗日战争的战略策略和新民主主义政权问题的著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大的历史收获”,从中可以看到党的领袖如何依据丰富的实践经验运用辩证法,科学分析总结中国社会具体特点、中国革命历史经验与国内外形势,进而把握抗战发展的规律和中国革命战争的科学理论,并指出党在政治、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斗争前途和政策^③。为此,党的“教育人才应该是创造性的马列主义者的信徒”,应该学习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创造性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和灵魂,学习他们如何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善于区分马克思主义的文字与本质,如何以新的实践经验去发展深化马克思主义。张如心区分

了“创造性的马列主义”与“教条性的马克思主义”的实质表现,主张“以新的经验去充实发展马克思主义”^④。

中央马列学院编译部主任张仲实认为应学习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在推进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进程中的典范做法。他发表的《掌握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一文分三部分,前两部分论述列宁、斯大林在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俄国革命建设实际创造性结合的理论贡献,进而为第三部分中国共产党“学习列宁和斯大林底榜样”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合法性依据,找寻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应用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中,在建立民族统一战线、革命军队建设、军事战略战术、政权问题诸方面,丰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革命问题的理论,在实践中推动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和政权理论的发展。中国共产党人应学习列宁、斯大林如何“精通创造性的马列主义”,运用其分析研究中国具体国情和社会特点,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⑤。

杨松主张采用唯物辩证的方法。我们作为“创造式的马克思主义者”,应采用毛泽东主张的唯物辩证法,在推动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中国革命实际的进程中,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他立足于人类文明演进规律的角度,主张在中国和世界的关系上,既反对将中国社会的发展游离于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之外,也反对中国教条主义复制西欧

①张如心:《论创造性的学习》,《解放》1941年第131.132期合刊。

②张如心:《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前进》,《解放》1941年第127期。

③艾思奇:《抗战以来的几种重要哲学思想评述》,《中国文化》1941年第3卷第2、3期合刊。

④张如心:《论布尔塞维克的教育家》,《共产党人》1941年第16期。

⑤实甫:《掌握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为纪念列宁逝世十七周年而作》,《解放》1941年第123期。

和苏联革命的经验。只有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规律性,才能把握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性。采取这种辩证唯物的马克思主义方法,是完成推动创造性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任务的唯一途径^①。

和培元提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的结合、与中国历史实际的结合的主张。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法论的论述,为理论工作者指明前进方向。为此,和培元呼吁“我们必须向着这个方向努力”,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和历史实际的结合的深入发展。为此,他对理论工作者提出四点要求:首先,必须紧密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走出哲学教科书抽象的理论思辨,对中国革命丰富的实践经验进行理论总结,才能在哲学著作中展现生动鲜活的具体内容。其次,必须“系统地研究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的哲学史”,以此推动“历史唯物主义的中国化”。再次,必须从哲学的观点深入系统地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各种重要著述,领会其中辩证唯物论的精髓实质,学习其观察分析问题的立场、方法与如何具体地运用于革命实际。最后,必须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系统研究中国各党派的哲学思想,开展思想领域的严肃斗争,这一斗争的开展有利于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②。

景仁主张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进行贯通性的研究,从中学习体会其精髓要义,推进当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未竟事业。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的学习问题上,顾此失彼、厚此薄彼的做法均是失之

偏颇的。理论工作者不仅要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奠定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时也要分析研究其后继者对马克思主义在新的时代条件和具体实践中的新发展。列宁、斯大林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如何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发展马克思主义,将自由资本主义阶段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列宁主义,进而发展为社会主义建设阶段的斯大林学说,分别进行了具有时代特点的探索。他们新的实践中充实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中国共产党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若系统深入研究党的历史 and 实践经验,进行理论上的总结提升,必将推动马克思主义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发展。中国和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者,必须从毛泽东著作中学习如何发展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其创造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因此,“在学习马列主义时,必须注意其历史的发展,在马列主义的每个基本问题上,必须了解马恩的意见与列斯所给予的新贡献,以及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问题与一般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问题上对于马列主义的新贡献”^③。

这些理论工作者的见解,从不同侧面阐释了推动“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有助于突破教条主义思维方式造成的某种程度上的思想桎梏,推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1941年9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要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在全党要传播前者并批驳后者,推动中国革命经

①杨松:《关于马列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中国文化》1940年第1卷第5期。

②和培元:《论新哲学的特性与新哲学的中国化》,《中国文化》1941年第3卷第2、3期合刊。

③景仁:《略谈学习马列主义的方法》,《解放》1941年第127期。

验上升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①。党内其他领导人赞誉毛泽东代表了辩证法和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这意味着在领导层内“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者要让位于“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宣示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发展创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合法性。同时也是对主观主义的两种形态即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宣战,极力肃清其在党内的残余,进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创造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推动中国革命实践在理论层面上升为马克思主义形态。

从中国共产党“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命题的提出,到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产生,需要一个过渡环节。“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概念的提出,为经典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之间,提供了一个必不可少的逻辑链条。这一概念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俄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作出一定的区别,在强调前者本源性的同时,突出后二者产生的时空环境不同,扎根的文化土壤各异,面临的具体任务不同,因而应该以不同的构成体系和内容形式呈现。这一概念是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创造性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果,联共(布)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于帝国主义时代的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方法论的启示,推动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将马克思列宁主义运用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这一概念的引入获得中国共产党领导层认可,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走向理论自觉的道路上迈出关键一步。这一概念在延安理论界获得普遍认可,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发展为自成体系的理

论形态,进而提出概念命名的必不可少的逻辑链条。

三、从“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到“毛泽东思想”的确定

从引入“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概念,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概念命名,中间经历了一个长期的酝酿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将创造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指向了其创作主体,即以“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文化发生学认为,任何思想理论的提出,都是当时社会的产物。当时,毛泽东已经建构起一个涵盖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的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系统阐明了新民主主义理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渐次形成。基于毛泽东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的重大贡献等因素,中国共产党人开始突出宣传毛泽东的理论贡献,进而以“毛泽东”命名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此后,党的领导人与相关理论工作者在一个较长的时段内,开始阐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命名,陆续提出“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和策略”“毛泽东主义”等一系列内涵相关、逻辑演进的概念。毛泽东同意以“毛泽东思想”命名其思想体系,党最终确定以毛泽东思想为全党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归纳和概念命名,同样受到苏联的影响。《联共党史》关于列宁主义理论体系形成过程的总结,为当时延安的理论工作者提供了借鉴思路。该书指出:列宁的系列著作分别构建

^①《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374页。

了“党的思想基础”“组织基础”“策略基础”“理论基础”^①。该书关于列宁主义理论体系的概括,为中国共产党构建“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提供了方法示范,为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提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概念奠定合法性基础。

1941年5月,杨松参照《联共党史》的说法,列举列宁、斯大林的主要著作,指出它们分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社会主义理论、党的学说等方面的进一步发展^②。在此基础上,张如心创造性地将这一方法用于总结毛泽东的思想体系。1942年2月,他提出,20年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了一套关于中国革命的科学系统的理论和策略,他的系列著作分别奠定了党的“思想方法的基础”“政治基础”“战略策略的基础”“军事基础”。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是中国共产党成为坚强的布尔什维克党的“主要标志”,“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的创造性发展^③。

同时,一些理论工作者开始探讨毛泽东取得巨大理论成就的内在原因。张如心指出,毛泽东主要在民族统一战线、军队建设、政权建设和革命战略战术的理论与实践的诸多方面发展了创造性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革命和人民解放事业具有极大意义,成为“大多数(如果不是一切的话)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极宝贵的革命资本”,必将推动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运动。毛

泽东之所以取得这种成功,主要是因为他唯物辩证地了解中国具体国情,娴熟运用唯物辩证法这一发展创造性马克思主义的锁钥^④。

毛泽东是“创造性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的主要代表。因此,中国共产党的教育人才应“忠实于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主张“以毛泽东同志的创造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来教育全党^⑤。这一表述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与列宁、斯大林的思想并列,并提出这一思想要成为全党的指导理论,蕴含将其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的意味。这是张如心为毛泽东的思想命名的初步表述。

张如心还首次使用“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的体系”这一概念指称毛泽东的思想,阐释其组成部分及相互关系,揭示其理论内涵及思想方法,并首次从正面阐述“毛泽东主义”概念^⑥。这一概念提出后即得到党内呼应。1942年7月1日,时任《晋察冀日报》社长兼总编邓拓在社论中采纳张如心概括“毛泽东主义”的理论体系的方法,将毛泽东的思想视为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指导思想和方法论相结合的完整体系,是创造性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新发展,强调“马列主义的中国化就是毛泽东主义”。^⑦

当时特定的国际国内环境,促使中国共产党在指导思想上树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旗帜,推动了“毛泽东思想”概念的形

①参见《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目录,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②杨松:《关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书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底宣传》,《解放》1941年第128期。

③张如心:《学习和掌握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解放日报》1942年2月19日。

④张如心:《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前进》,《解放》1941年第127期。

⑤张如心:《论布尔塞维克的教育家》,《共产党人》1941年第16期。

⑥张如心:《学习和掌握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解放日报》1942年2月18日、19日。

⑦《邓拓文集》第1卷,北京出版社1986年版,第42页。

成和提出。1943年6月,共产国际宣布解散。国民党随即在意识形态领域掀起舆论战,大肆宣扬“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攻击共产主义为不合当前中国国情的“舶来品”,在今日并无实现的可能,奉劝中国共产党“收起”共产主义理论,取消“封建割据”。与此同时,国民党企图进攻陕甘宁边区,实现其军令政令“统一”。在此严峻形势下,中国共产党迫切需要构建一个系统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用于统筹指导与国民党的舆论斗争。这个理论体系,一方面延续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历史,高扬中国共产党始终信仰的马克思主义旗帜;另一方面必须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指导中国革命继续前进。就当时情形而言,只有毛泽东建构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在全党确立毛泽东的思想的理论指导地位,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斗争中统一全党精神意志的理论武器,指引民族未来前途的重要举措^①。

1943年7月,刘少奇撰文沿用张如心“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概念^②。同时,毛泽东同意王稼祥使用“毛泽东思想”概念命名其思想体系^③。不久,王稼祥撰文首次明确提出并多次使用“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并较为系统地概括和界定其内涵。文中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理论运用于中国革命实际产生的理论成果,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引领中国民族解放和共产主义制度实现的保证^④。这一界定所揭示

的内涵,标志着“毛泽东思想”作为概括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体系的科学概念,经过革命领袖和理论工作者较长时间的探讨终于形成。这一概念的正式提出和在党内得到普遍接受,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性质的事件,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领域以一整套“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话语,取代“言必称马列”的教条主义思维体系,是中国共产党自我主体意识和理论自觉的体现^⑤。特别是经过整风运动,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方法得到普遍确立,党内领导层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逐渐趋于一致。

1943年11月,邓小平最先提出把“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即“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指导思想^⑥。1945年,党的七大通过的党章规定将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一切工作的指针,有其基于历史与现实的多重考量。就党的历史而言,理论水平的欠缺是过去革命实践中发生多次挫折的重要因素,毛泽东思想就是在汲取以往经验教训基础上经历了无数艰难险阻的探索后形成的。就当时现实而言,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革命道路的象征”,是“实现党的统一和团结”的思想基础,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应对国民党反攻舆论攻势的理论武器。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而言,提出毛泽东思想是应对苏联和共产国际潜在影响的理论屏障,是中国共产党在指导思想上谋划独立自主的思想指南^⑦。至此,

①张忠山:《历史与逻辑: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概念的提出》,《党史研究与教学》2015年第6期。

②刘少奇:《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解放日报》1943年7月6日。

③张静如:《毛泽东研究全书》第1卷,长春出版社1997年版,第307—308页。

④王稼祥:《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道路》,《解放日报》1943年7月8日。

⑤梁化奎:《毛泽东思想在一个话语地带的表达传播》,《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3年第6期。

⑥《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8页。

⑦《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增订本),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0—11页。

毛泽东思想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正式完成了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使命。

“毛泽东思想”概念提出的历史过程,表明理论与实践双向互动是概念形成完善的动力;概念提出的依次演进的逻辑路径,表明了认识发展的阶段性和渐进性。这一概念生成的演进逻辑,对于我们认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具有一定的启示。首先,马克思主义从理论形态到实践形态的历史进程,必须正确认识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推动辩证法唯物论与特定的历史时代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并且在实践中产生富有各国特色和民族风格的理论形态。其次,马克思主义在内容实质上是国际主义的,在其表现形

式上则是民族主义的。全世界无产阶级追求解放的共同目标,是由各国无产阶级经过不同道路、以不同形式实现的,即毛泽东指出的“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①。最后,全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者尽管在实现共同的目标中所走的革命道路有所不同,但在共同的革命事业上确实利害攸关,相互之间产生重大影响。在“毛泽东思想”概念生成的演进逻辑中,苏联和共产国际以历史经验和理论资源的形式,对于中国共产党确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产生了重要影响。

(责任编辑:彭秋归)

^①毛泽东:《论新阶段》,《解放》1938年第57期。

CONTENTS

- Uphold and Develop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Strive to Write a Brand New Chapter of a New Journey in the New Era XIAO Guiqing(4)
- The Profound Impact of Ten Years of Great Changes in the New Era on the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LIU Jianwu(7)
- The Experienc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the New Era to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Marxism in China WU Huaiyou(12)
- Leading the Great Social Revolution with the Party's Self-Revolution WANG Xiang(16)
- A New Chapter in Upholding and Developing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Hunan in the New Era
Research Group of Huna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20)
- Promoting the Common Prosperity of People's Spiritual Life: The Background, Goal Requirement and Practice Path MA Zhenqing, MAO Yujuan(36)
- The Generative Logic and Practice Path of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s Important Discourse on Big Social Course PAN Jia Jun, SUN Pin(44)
- From MAO Zedong to XI Jinping: The Construction and Continuation Logic of Chinese Communists' View of Struggle ZHOU Xiaoli, HOU Ting(53)
- MAO Zedong's Understanding and Practice of Party Building around the 1930s HUANG Yanan(61)
- A Reexamination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Young MAO Zedong's World View—Comments on the “Summer Theory”, “Winter Theory” and “Process Theory” in 1920 WU Xuan(71)
- The Evolution Logic of the Concept of “MAO Zedong Thought” in Yan'an Period ZHANG Zhongshan, CHEN Lei(80)
- By “Summarizing Experience and Finding out Rules” to Develop Economy—Study on the Edition and Core Meaning of *Economic and Financial Problems* by MAO Zedong ZHANG Shude, ZOU Weishao(92)
- On the Ten Major Relationship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Modernization Discourse LI Yongjin, CHENG Fan(102)
- MAO Zedong's Thinking on the Problem of Petty Bourgeoisie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An Exploration Centered on *Speeches at the Yan'an Forum on Literature and Art* ZHANG Huipeng(111)